论李煜词的文学共同美

刘凌云

一、李煜词的习惯性审美经验的类型

第一，艳情生活型。作品虽然反映的是南朝小朝廷的宫中的享乐生活和艳情遭遇，但却避免和消除了传统宫体诗中的腐朽昏庸味。如《一斛珠》（晓妆初过）、《玉楼春》（晚妆初了明肌雪）、《菩萨蛮》（花明月暗笼轻雾）等。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透露着“人间色彩”：人间的思绪，人间的情调，人间的爱恋。

第二，离情别绪型。诗人真切的抒写了自己在社会动乱生活中的内心变化。这种变化集中表现在离情别绪中。李煜被俘前和被俘后的作品，都有过这类审美经验的反映，如《捣练子令》（深院静）、《清平乐》（别来春半）、《乌夜啼》（无言独上西楼）、《虞美人》（风迴小院庭芜绿）、《谢新恩》（冉冉秋光留不住），《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阮郎归》（东风吹水日衔山）等。李煜常常用“淡笔”点染庭院、楼台、春草、新月、秋菊、细雨，在这些习见的景物中，含蕴着人人常有的离情别绪。

第三，忆昔伤今型。这些词多写于汴京。南唐小朝廷国君李煜被俘而解到汴京囚禁，痛苦可以想见。很多作品激情地回忆昔日故国的生活，哀伤今天凄凉的遭遇。这类审美体验抒写得特别具有“浮雕感”。从这类作品中似乎可以想象，就像看浮雕一样，亲眼看到有过不幸者的精神形象。最著名的是《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浪淘沙》（帘外雨潺潺）、《望江南》（多少恨）、《浪淘沙》（往事只堪哀）。其他如《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望江梅》（闲梦远）、《子夜歌》（人生仇恨何能免）等。也都是沉郁感人之作；不过前两首是单纯写“忆昔”并未说“伤今”，只是从回想故国由安宁到沦落的悲惨命运，遥忆南方芳春清秋的美景，寄托着“伤今”的潜台词。

这三种类型的习惯性的审美经验，构成了李后主词的共同美。正是由于他写的此情此景都是人们所常见的，他的作品才能够在人们的心灵深处激起感情的浪花儿，产生共鸣。而这共鸣也正是作品本身的共同美取得的审美效益。所以，很显然，文学的共同美，是促进李后主词作能够长期流传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

二、李后主词作文学共同美产生的原因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

清淡的形象，深沉的激情，鲜明强烈的审美对比，组合为作品征服人的活力和气势。两篇词作并没有描绘突出的景物，只是轻轻点到：小楼、东风、细雨、罗衾（实写），又飘然托出：春花秋月，流水落花（虚写）。凡此种种，均重在借清淡平常之景，寓深沉悲凉之志。作品用对比来显示审美感情，特别是《虞美人》，它连续创造了三个非常贴切精巧的对比。“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意为春花秋月，光阴飞逝，有许多往事值得回想。《唐宋词选》把“春花秋月何时了”解释为“怕看春花秋月”，不确切，未必符合原意。这两句中的对比，体现在前者伤今，后者忆昔。“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这里的“小楼”并非南唐都城金陵的小楼，而是宋太宗囚禁李后主的处所，因此，两句仍是伤今与忆昔的对比。“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则是以忆昔来对比伤今。在一连串三个对比之后，作品以“问君”作结，此处名为“问君”，实则“自问”，自答。“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正是作者和盘托出的答案。诗人对自己的心灵和精神世界，表露得如此真诚坦率，一下子拉近了作者和读者的心理距离，从而深化了词作的审美共鸣作用。

李后主词显示的审美经验和生活遭遇，是具有普遍性的。他写出的“亡国之痛”“亡国之音”是非常个别的、特殊的，即使写得再深沉，也不过具有一定的认识意义，难以产生普遍性的审美效果。而现在，他抒发的却是：不幸遭遇的慨叹，痛苦境地的哀伤，舒适生活的回想——这些习惯的审美经验和体会，却具有深远的普遍性意义。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现实生活中，谁能永远一帆风顺呢？谁能够不遇到不幸和痛苦？谁又能够不对自己经历过的某一段舒适生活的消逝而不激起回忆怀念之情呢？

李煜词反映了习惯的审美经验，描写了人人常见的“景”中之“情”，它也就产生了文学共同美的心理及感情基础，从而能够打动众多的读者。

林黛玉并没有“亡国之痛”，可是她却能够欣赏极写“亡国之痛”的李后主词《浪淘沙》。为什么李后主的“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能够感动林黛玉？就是因为他们在审美经验上有相似之处。李后主哀叹美好的时光如落花流水，杳然逝去，无处找寻；林黛玉悲伤自己身世坎坷，寄人篱下，命运凄凉。基于这种共同的感触，她才和李后

主有了感情上的共鸣。此后，林黛玉在《葬花词》中哭道“花谢花飞飞满天，红绡香断有谁怜?”这是首句。还有末四句“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第二十七回)她的这些悲叹身世的诗句，与李后主的“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对照看来，在思想感情的基调方面是一致的。黛玉哭花，实是哭自己；李后主痛惜流水落花，芳春消逝，也正是痛惜自己不幸的命运。

李煜创造的文学共同美，其可贵之处正在于：诗人真切的以人人常见情景，作为心灵共鸣的桥梁，极力表达出“感受者”自己，表达出他们“早就已经想表达”的许多情感。尽管它的思想基调不够昂扬进取，但它毕竟打动了人，占据了许许多多“感受者”的精神空间。

共同的人性，是形成李煜词作共同美的另一重要因素。“心有灵犀一点通”是人类所共有的共同的思想情感。且看如下词作：

“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

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清平乐》)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乌夜啼》)

“深院静，小庭空，断续寒砧断续风。无奈夜长人不寐，数声和月到帘栊。”(《捣练子令》)

情真真，景美美，意深深，味浓浓，这是三首词的共同点。它们都成功地创造了令人难忘的意境。作品都是以感情为辐射中心，把诗人“我”的感情悄悄地辐射到周围的“物”上。那些无知的“物”，如落梅、春草、弯月、梧桐、小庭等，似乎都被渲染了“我”的感情。同时，“物”也在悄悄地向“我”做某些感情表示和反应。这里，李后主用的是19世纪西方美学家提出的“移情”手法，他在这三篇词作中想要凸现什么感情呢？是一个“愁”字。或抒发对远方的怀念，或显现离别后的痛苦，或表露凄清而可怕的孤独，一切感觉都深深地打上了“愁”的印记。

李煜词大多数都在倾吐着愁苦和哀痛。有直接道出：“春光镇在人空老，新愁往恨何穷?”(《谢新恩》其四)“人生仇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子夜歌》)有的并未见“愁”字，而愁情自现，如“何处相思苦？纱窗醉梦中。”(《谢新恩》其三)“流连光景惜朱颜，黄昏独倚阑。”(《阮郎归》)有的篇章始终没有提到“愁”，却极其深沉地把“愁”写得升了一级。“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浪淘沙》)“心事末将和泪说，凤笙休向泪时吹，肠断更无疑!”这哪里是“愁”，简直是泪眼蒙眬的哭诉!

三、李后主词作“愁”情之本质

李煜词中的愁苦、悲伤、哀怨之情，是一个人性的感情，是一种人类所共同拥有的感情，是一种人类所共通的感情。中国古籍中提出过“七情”之说，如《礼记》中明确提出“何为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否学而能。”中医学也曾认定喜、怒、忧、思、悲、恐、惊为“七情”。前者是从心理作用而言，后者乃就生理因素而论。两者指的都是人类本身所具有的感情。在《礼记》以前，有学者曾明确探索过人类的“同美”“同好”问题。孟子说“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荀子也提出“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声而声乐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妇女莫众焉；形体好佚而安重闲静莫愉焉；心好利而骨禄莫厚焉。”孟子、荀子在人性问题上虽然有“性善”“性恶”之争，但在主张人类都具有“同美”“同好”，强调人性中有共通的情感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

李后主的词比较突出地渲染人性的精神和人类共通的情感。词作中体现的愁苦、悲伤、哀怨之情，都是其作品的主线索。词人着力托出的人类共通的思想感情，是鲜明而深沉的，它构成了作品扣人心扉的文学共同美。

通篇是静态和动态的融合，时间和空间的跳跃。主人公的感情形象如蜻蜓点水，若即若离。随着时辰的舒缓推移，从白天到傍晚，由新月初挂到明烛之夜，内在的思绪越来越加深了浓度。末句“满鬓青霜残雪思难任”，乃点睛之笔，一下子勾画出主人公感情形象的整体面貌。这篇作品，也正像前引的“无言独上西楼”那样，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对主人公具体身份、职业、阶层等的细节描绘，而集中地通过平凡景物的点染，显示出一种愁苦、悲伤、哀怨之情。此等愁情，就是人类共通的感情。它在某些特定的生活环境下，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欣赏。他们从自己不同的审美个性出发，在作品里寻找到某种特殊的寄托和安慰。

李后主词能够为“一切时代所共享”，具有文学共同美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习惯性的审美经验，人类共通的感情，正是构成李煜词作文学共同美的两个主要因素。

[参考文献]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唐宋词选[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1980:70.

[2] 托尔斯泰. 艺术论[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28.

[3] 德·利普斯. 论移情的作用[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145.

[4] 礼记·礼运[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165.

[5] 孟子·告子上[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236.

[6] 荀子·荣辱[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176.

[7] 荀子·王霸[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158.

[作者简介]

刘凌云(1968—),女,硕士,安阳工学院文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